

科学发展观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典范

周建标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 从理论渊源来看,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一是科学发展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体现古为今用的民族性;二是“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体现推陈出新的创新性;三是“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外最新发展理论,体现洋为中用的开放性。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 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15-05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可见,科学发展观有三大理论渊源:一是科学发展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科学发展观“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三是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外最新发展理论。

从理论渊源来看,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一是古为今用的民族性;二是推陈出新的创新性;三是洋为中用的开放性。科学发展观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典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一 科学发展观体现古为今用的民族性

科学发展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古为今用的民族性。正确分析科学发展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培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做到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兼备,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们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消极腐朽思想,充分认识其危害性,使人们彻底摆脱其束缚与侵害。

科学发展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并创新了“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思想”。

(一) “以人为本”提升了“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在《尚书》中就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到战国初期的孟子提出了系统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的民本思想,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确结论。荀子则进一步把民与君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水与舟的关系,指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后来成为李世民等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格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总体而言,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强调民众的作用,但它毕竟看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2]。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提升了“民本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进步精神。

1、“以人为本”提升了人的主体性

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强调民众的作用。“民”是“君”和“官”的统治对象,“人”相对于“神”、“物”而言。在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中,“人”指的是“人民群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摒弃了封建统治者的“驭民”、“治民”的糟粕,创新了民本思想,提升了人的主体性。

2、“以人为本”强调了发展的目的性

胡锦涛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全面发展,促进人

[收稿日期] 2010-11-16

[作者简介] 周建标(1964-),男,福建平潭人,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的全面发展。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继承创新了“天人合一”思想

1、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追求天人和谐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被称为天人之学。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和行为要与自然相一致，达到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伦理道德）的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纵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有道家“回归自然”的“天人玄同”说；有儒家的“天人相通”说。观点虽然有差异，但都主张天人和諧。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天道入手来把握人道。老子要求人们放弃一切违背天道的人为行动，而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只能辅助万物的本性去发展，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人道入手来把握天道。儒家认为，人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源于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儒家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模仿自然，修身养性^[4]。

2、天人合一观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文化支撑。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天人合一观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生态伦理思想”。

(1)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天人合一观的“整体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观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强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继承创新了天人合一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思想的民族性和时代特点。科学的发展观从整体出发，统筹兼顾，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未来的发展创造好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理念继承创新了传统的协调平衡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理论，认为世界万物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认为世界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对立统一，并能互相转化。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理念，体现为“八个统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切实做到“八个统筹”，才能把科学发展落到实处，才能推动我国的发展。

(2) 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天人合一观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要

求他的学生要从亲情之爱扩展到人际之爱，要博爱大众。孟子把孔子的仁爱思想从“泛爱众”扩展到“泛爱众生”。《孟子·尽心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关爱万物。孟子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发利用自然环境，彰显了人类在生态环境面前的主动性，为人类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提供了价值论支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渊源。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想，需要人类的道德、理性来约束。发展当然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但是面对人类无限的欲望，又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科学发展可以理解为需要发展与限制发展的统一，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又要限制当代人需要的统一。将道德的关怀扩展到非人的自然界，这种崇高的境界可以使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一定的理性控制，把人们的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升华了传统“和谐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继承创新了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

“和谐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史伯认为，不同事物相互结合，能使事物生成和发展，相同的东西简单叠加，则只能导致死板和僵化。“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华传统文化提倡“中庸之道”，追求人际和谐。在人际关系上，儒家认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相处，促进人际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孔子倡导“克己复礼”，克守自己的礼仪规范，做到长幼有序。孔子希望每个人都能加强自我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不但要求他学生要“仁者爱人”，还要从亲情之爱扩展到人际之爱，博爱大众。最后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已经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1993年8月，“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在芝加哥召开，通过并发表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5]儒家为了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中”、“和”两条途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心理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意思是“掌握事物的‘过’与‘不及’两个极端，采

取“中正”的办法施行于民。”中庸之道,经过儒家学者不断发扬光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制的作用来保持人际和谐。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了对人际和谐的追求^[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求“和”的人生智慧,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保持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老子设计了一个小国寡民的和谐世界,孔子提出小康和大同两个不同层次的和谐社会。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康乾盛世,从太平天国的人人平等到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 科学发展观体现推陈出新的创新性

科学发展观源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各国面对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探索中国的发展问题。

(一) 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发展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不但注重发展的目的性(为了人民);而且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全面发展、统筹兼顾)和可持续性;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又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发展问题的结晶

中国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课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1、毛泽东“发展生产力”和“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走“工农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初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后来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同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的矛盾),强调要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发展思想。

2、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思想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同时,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分析我国国情,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步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3、江泽民“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发展思想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时期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课题。从政治的高度要求“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7]突出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4、胡锦涛“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的发展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

(1) 全面发展观

2003年4月14日,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8]。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会议上,胡锦涛强调指出“要更好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

(2) 科学发展观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首次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8]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科学发展观,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表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3)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

2006年10月8日~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形成。

2007 年 10 月 15 日~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

(三) 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标志着我们的发展观由“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我国政府正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追求又好又快。

科学发展观既汲取了“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教训,也继承了毛泽东的发展思想(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十一届二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只有改革和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三步走战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体现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科学发展观继承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精髓。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归结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提出了全面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是民族灵魂的思想等,并把新时期党的历史使命归纳为“三个代表”。江泽民更加强调发展的机遇和速度,提出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级分化,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平稳和快速的增长。江泽民的发展思想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三 科学发展观体现洋为中用的开放性

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外最新发展理论,体现洋为中用的开放性。

国际上普遍关注发展问题,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经济,恢复生产,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当时许多国家的普遍共识,唯

GDP 论成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 经济增长论

1956 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他将发展视同于增长,把 GDP(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 GDP 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经济增长论,简单地说,就是“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追求 GDP 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加重,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动荡加剧等全球性的问题。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反思唯 GDP 论所带来的发展问题。

(二) 发展极限论

1969~1973 年,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发展极限论,认为生态环境快到了极限,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提出“发展=经济增长+自然生态”的发展模式,有力地冲击了经济增长论的发展模式,但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

(三) 可持续发展观

1987 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形成了“发展=经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1992 年 100 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行动议程》,承诺推进可持续发展。

(四) 全面发展观

1995 年,哥本哈根世纪人口与发展会议,提出“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模式,认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全体人民,要建立“以人中心”的发展框架,把“人”与自然、经济、社会融为一体,全面考虑发展问题,否定了以往“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国际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和“全面发展观”,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尽管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做出承诺,却不兑现承诺。直到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欧美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世界气候变化,互相推脱责任。而中国人均排放远低于欧美,而且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却能够承诺“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可见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信心和决心,更由于科学发展观植根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科学发展观既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从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渊源入手,可以清晰地看到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EB/OL].

- [2006-04-22].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lhdh/2006-04/22/content_260592.htm.
- [2] 周建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契合[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7-12.
-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850.
- [4] 周建标. 传统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104-110.
- [5] 周建标.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25-28.
- [6] 周建标. 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65-69.
- [7]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38-539.
-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下) [N]. 人民日报. 2009-10-04(3).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a Model for Chinese Culture Modernization

ZHOU Jian-biao

(Party School, CPC Quanzhou Committee,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origin,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fully embodies the Basic ideas for Chinese culture modernization. The first is tha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herits the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traditions, and reflects the nationality; the second is that it summariz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xperience, and reflects innovation; the third is that it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learns from the latest foreig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eflects the openness of learning from others.

Key wor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origin; Marxist; culture modernization

(上接第 14 页)

- [3] 郑小勇. 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竞合: 回顾与展望[J]. 经济纵横, 2007(8): 50-54.
- [4] [美] 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78.
- [5] 蔡宁, 吴结兵.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 中国工企经济, 2008(3): 44-46.
- [6] 童昕, 王缉慈. 东莞 PC 相关制造业地方产业群的发展演变[J]. 地理学报, 2001(6): 722-729.
- [7] 项保华. 企业战略管理若干问题试析[J]. 南开管理评论, 1999(4): 58-61.
- [8] 仇保兴. 小企业集群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8): 46.
- [9] 师汉民. 论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共生[J]. 中国机械工程, 2000(1): 121-126.
- [10] Belleflamme P, Picard P, Thisse J F. An Economics Theory of Regional Cluster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1): 159-184.
- [11] 周宇, 邹树梁. 衡阳市钢管线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对策[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122-126.

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ower Transmission Industry Cluster in Hengyang City

DENG Bang-jiao, XIAO Dong-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o-opetition theory and the targe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of Hengyang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indeed interview and surve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s of inside cluster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s. At last,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clusters development it puts meaningful and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s; mechanism